

可敬可爱彭子冈

胡天培



彭子冈一家

《彭子冈文集》面世了。女儿徐东为了出版父母徐盈、彭子冈的作品，真是费尽了心血。十多年来，她为了搜集、整理、研究父母的旧作，跑遍了图书馆，上网寻索，向研究徐盈、彭子冈的专家求教。她收集了父母在不同时期不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然后编辑成集，出版成书。她先后编印了《回忆徐盈与彭子冈》《共和国前夜——一代名记者徐盈战地文选》《家国萦怀不计年》三部有关父母的著作。

《彭子冈文集》的出版，让读者们进一步看到了彭子冈作品的全貌，更感到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记者、作家。也让我们知道，作为一名记者、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忠于职守、服务于人民。

供职大公报社

徐盈、彭子冈是名记者、名作家，我早闻他们的大名，聆听教诲还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事。我和他们的儿子城北是高中同学，同届不同班，在校时未曾交往过。1965年年初，住在同院的冯亦代先生告诉我，城北把作家浩然的《艳阳天》改成了六幕戏剧，他看了，很不错。他知道我认识浩然，希望我拿给浩然看看，我欣然应允。浩然看过剧本，也认为很好，立刻拿给一家剧团，希望能够上演。从此我就和徐家有了来往。

不久，城北去了新疆，我还常到他家看望。徐东当时还是个腼腆的中学生，很少看见她。偶尔见面，也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而已。徐盈和彭子冈都是忠厚、慈祥的长者，长期服务于大公报社。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在武汉经胡绳等人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彭子冈中学时代就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发表文章，并多次获奖。后来任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主办的《妇女生活》杂志编辑和《大公报》记者，更是佳作迭出。在胡愈之、邹韬奋诸革命人士的帮助、鼓舞下，她的思想一天比一天进步。

1936年，彭子冈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并写了《伟大的伴送》一文，得到报界人士好评。1937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无理逮捕了沈钧儒、史良等坚决主张抗日的7位爱国人士，酿成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25岁的彭子冈化名小梅，冒称“堂妹”前往苏州看守所探望了史良律师，写出了抨击国民党无理迫害爱国人士的文章《堂姐史良会见记》，发表在《妇女生活》杂志上。

1938年武汉失守，徐盈、彭子冈夫妇到了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工作。彭子冈利用大公报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各方面人士。她不畏艰险、亲临前线，访问了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写了《张自忠将军会见记》一文，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细致描述了张自忠的言行举止，

生动地表现出他抗战到底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彭子冈坚决抗议日军侵略中国的无耻行径，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因重庆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对新闻检查很是苛刻，她就把锋芒尖锐的文章寄到桂林《大公报》发表，帮助人民了解大后方的情况。

1945年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彭子冈到机场迎接，并写了《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重庆四十四天的毛泽东》。她写出了近距离观察毛泽东的所见所闻：“他平静、沉着，与人交谈自然、坦诚，常用语是‘和为贵’，有时也很幽默、风趣。他喜欢抽烟，会跳舞，处处显示出大政治家的风采。”这两篇文章简洁、质朴，很有特色，不少专家认为：文章的思想 and 文风至今仍不失为新闻写作的范例。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彭子冈采访了刚解放的华北名城张家口，并写出了《张家口漫步》一文，连载于天津《大公报》上。文中写道：“城市秩序井然，处处洋溢着民主气氛，人民安居乐业，作家、学者们都心情舒畅地积极工作。”她告诉广大读者，共产党不但能治理农村，也能管理城市。

解放战争开始后，彭子冈连续发文揭露国民党的罪行，抨击美帝国主义的罪恶。国民党当局对她又恨又怕，一次采访时，国民党高官蔡文治指着她怒问道：“彭子冈，你的文章太有煽动性，你是共产党吧？”她响亮地回击：“承蒙高抬，你过奖了，我还不够格。”国民党要大公报社解聘彭子冈、徐盈，报社以拖延应对。

报道新中国新气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子冈非常高兴，她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她要为新中国作出新的贡献。彭子冈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任记者，她到处采访，写了不少报道新中国新气象的通讯。

当时，大型工程官厅水库正在建设中，她来到工地，深入到群众中访

问，连续写了几篇好文章。最使我感动的是《官厅少年》，她把年仅16岁的主人公严春富写得那么生动、可爱。一个既朴素又诚挚的少年鲜活地浮现在眼前。严春富热爱家乡，更热爱他工作的官厅水库。他对自己识字少不满意，彭子冈鼓励他不要着急，努力学习，自然会有文化的。记者赢得了少年的信任，他敞开了心扉：“他喜爱画画，他要学会骑自行车，要争取加入共青团，要做一个好工人。”彭子冈坚信严春富的美好理想一定能实现。

1955年1月，彭子冈任新创刊的《旅行家》杂志的主编，她团结编辑部同仁，力争把杂志办成全国最好的刊物。她采访名家沈从文、吴祖光、姚雪垠、徐迅、黄裳、靳一等，约他们写稿，为他们写稿，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当时我在中学读书，老师、同学们最爱看的刊物就是《旅行家》和《新观察》。

彭子冈认为，旧社会，新闻工作者应该和全国人民一道，把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启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新闻工作者应该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各方面的先进人物，批评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健康现象，这样才能使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人民过上好日子。

彭子冈不赞成整人运动，尤其讨厌风派人物。因为她敢于坚持真理，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免不了倒霉。1957年，徐盈和彭子冈虽然处于逆境中，但通过他们的言谈，看得出他们都是心胸坦荡、待人诚恳、知识丰富、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们受到冲击，后来又去了干校。徐东也下乡插队。后来，他们都回到了北京，徐东也分配了工作，我和他们的来往又多了起来。

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听到了不少在社会上听不到的消息。他们对革命事业仍然抱有坚定的信念，也都很热爱周恩来总理。彭子冈不停止一次谈到，周总理日理万机，太劳累了。得知周总理病重后，她更是难过，几次告诉我：总理瘦得不到80斤了，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她为周总理病情痛心，更为国家前途担心。

识何自而长，则普及而后民知爱国。”只有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提高全民族基本素质，确立全体国民国家意识和爱国思想，国家才能强大，牢不可破，从而立于世界不败之地。

开启民智的理念贯穿于张謇的其他校歌创作之中。譬如他先后创作的《通州女子师范学校歌》：“女子有学兮欣欣向荣，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隆。”《垦牧乡长乐镇初等小学校歌》：“大家爱国先爱乡。”

《通州小学校歌之二》：“成国民兮小学生，学生爱国须聪明。”《私立徐女学校歌》：“唯明大义能如此……后山后山，可兴起。”

《通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歌》：“朝气朝转……弃我升，启我卵，弃我升，启我卵。”

张謇在他的校歌歌词中，无不贯穿着开启民智、爱乡兴邦的家国情怀，对莘莘学子充分寄予了尽快成长为新式国民、民族未来的热切期盼。

《彭子冈文集》出版

粉碎“四人帮”后，徐盈、彭子冈都得到平反。彭子冈重任《旅行家》杂志主任编委，可惜他的身体已很不好，但仍然很关心她精心创刊的杂志。她不仅写稿、改稿，还在儿女的搀扶下拜访老朋友、老作家，向他们约稿，还给年轻作者看稿，帮助修改、刊登。我曾经帮助朋友办了一个刊物《成人写作》，向彭子冈约稿。她已病得厉害，但还是痛快地答应了。在儿子城北的帮助下，她写了一篇很漂亮的文章。彭子冈的作品大部分是通讯报道。她笔锋锐利，感情真挚，文笔俊逸、清丽，极有感染力，不仅具有新闻性，亦是极优美的文学作品。至今读起来，仍是美好的享受。

彭子冈几十年的记者生涯和她取得的卓越成绩，赢得了读者和专家们的好评。著名报人徐铸成说：“我觉得子冈的文章，除立场、观点正确外，文如其人，爽直、豪放，而细密处丝丝入扣，绵里藏针，皮里阳秋，所以当时吸引广大读者，篇幅耐人寻味，是富于战斗效果的传世之作……”诗人、作家袁鹰说：“她的笔，她的心，她的心，她的全部的爱，都留给人间，留给我们……”

彭子冈逝世33年了，徐东也年过七旬，身患多种疾病。她退休后全部精力都用于搜集、整理、研究父母的遗稿，先后出版了父亲的文集和纪念文集，今年又出版了母亲的遗集《彭子冈文集》。徐东继承了父母的文才，她写了不少与父母有关的文章，发表在内地和香港报刊上，对帮助年轻一代了解她父母所处的时代大有裨益。

《彭子冈文集》的开篇文章《母亲的风格》出于徐东的手笔，概括了彭子冈的一生和她为人文的风格：对敌人像雄狮一样勇猛，对人民充满了无限的爱。正像名记者戈扬所说：“使我纳闷的是，彭子冈，在国统区战斗了十多年，她的那支笔，她的采访行动，曾使反动派丧魂落魄，人们总认为她是一个多么厉害的女记者，原来却是如此的朴实、诚恳、温柔、可爱，有时还有点傻乎乎的，天真得像个孩子。”

(本文作者为北京文化学者)

张謇创作的校歌，还反映了他的主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1922年南通地区召开中等以上学校运动会，他又撰写会歌歌词，歌中唱道：“左手执枪右单刀，秋以讲武左训诏，士不可弱兮气不暮。”以《左传》中农闲讲武、治兵振旅的典故，鼓舞当代学子向古人学习。后据考证，这是我国最早的运动大会会歌，开运动会会歌先河。

随后张謇又创作了《各校营教练运动歌》：“肇民兵之根茎”，“以齐止伐武而材”“进于瑞士何有哉，进于成周何有哉”。号召广大学子加强体育锻炼，远学古代周朝，近学西方瑞士，野蛮其体魄，以勇武精神和勇敢力量阻止外族入侵，整个曲调激昂昂扬、催人奋进。

纵观张謇一生，兴办学校门类齐全、体系完整、数量众多，尤为值得赞叹的是他对校歌的认识和重视，超越同时代的诸多教育家。他自己撰写歌词、请人谱曲，传唱校园，对启发学生现代意识，砥砺学生为国勤勉学习，振奋学生精神，丰富校园文化，活跃校园气氛，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以后我国的校歌创作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铁流》的翻译和出版

崔鹤同



《铁流》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绥拉菲摩维奇在1921年至1924年间写成的著名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内战为题材，叙述了古班的红军——达曼军，带领红军家属和被迫害的群众，突破叛乱者和白匪军的包围，进行英勇转移的事迹，成功地塑造了坚定勇敢的革命领袖、共产党员郭如鹤的鲜明形象。

1931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去苏联的曹靖华应鲁迅之约，着手翻译了小说全文，瞿秋白代译序言，鲁迅亲自编校，并由鲁迅出资在其创办的三闲书屋印制出版。《铁流》甫一面世，便遭遭禁。鲁迅便设法通过好友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把书籍放在柜台下面，将1000册书一点一滴地渗到了读者中间。

其中代译序言的瞿秋白，1931年1月因王明的“左倾”宗派势力，已经被逐出中共中央。瞿秋白来到上海后，冯雪峰安排化名“林复”的他和夫人隐居在谢澹如的家中。瞿秋白

这两万字的序言译好后，由冯雪峰送到鲁迅手里进行编校。瞿秋白还给鲁迅附了一封短柬：“迅、雪：这篇序是译完了。简直是一篇很好的论普洛创作的译文……”鲁迅满怀喜悦地在《铁流·编后记》中说：“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较好的书，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存着借此来自然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这里的“译的”指曹靖华，“补的”指瞿秋白，“校的”指鲁迅。而冯雪峰是序言译文的“中转站”，也促成了瞿秋白和鲁迅的第一次愉快的合作。所以，《铁流》的成功出版，冯雪峰是幕后英雄。

鲁迅给《铁流》以很高的评价，说它是表现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成功之作。《铁流》的翻译引进，和同时期由鲁迅翻译并自费出版的日文版苏联作家捷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一起，开创了我国外国文学译介的先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钱锺书的不答之“答”

杨建民

钱锺书不仅以学识渊博著称，还被人称为有照相机般的记忆。这尽管由多位学人亲身体证证明，可也着实让人不可思议。

对这样的说法，一些人有所探究的质疑。有一位作者，在钱锺书逝世后，写有一篇文章，其中说自己在“干校”期间，曾当面问钱锺书为何要称“皮里阳秋”。钱锺书沉吟许久，却始始终答不出来。后来跟前一位“红学大师”拍案大笑，说出了个中的奥妙。这篇文章，发表了不少次。作者应该想说，钱锺书并不如你们说得那么“神”。

“皮里阳秋”算不上什么僻典。《世说新语》在我国有很大影响，很多文人都喜欢。其中“赏誉”篇中说：“桓茂伦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蔽中也。”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褒贬也。”即此人说活话时虽然不表扬或批评，可内心却自有“褒贬”。《世说新语》一书，钱锺书在其《管锥编》

中一再征引。对“皮里阳秋”出典的“赏誉”篇，甚至对褚裒此人，也在文章中有过说法。由此推断，钱锺书很难不知“皮里阳秋”的意思。

王水照教授对此事作了解读，他与钱锺书有过很长时间亲身接触，当时也在钱锺书任职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王水照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位老干部给他打电话，问一句诗的出处：“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王水照一口告诉：这是宋代王令的诗句。这位老干部立即说：“你真有学问，连钱（锺书）老也未能回答我。”原来，老干部先打电话问了钱锺书，钱锺书推给王水照。

听了老干部说法，王水照赶紧回答：“此言差矣。王令这首诗，《千家诗》里就有，你以后别再问钱先生这类问题了。”《千家诗》是蒙学课文，旧时代稍稍读过一点书的人都背过。王水照的一个比喻很能说明问题：“大学里教授上主课，助教才担任答疑的小课程，档次是不同的。”



启功的听课评课

夏明亮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启功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到北京的一所中学进行教育实习，正好中学派给他们的课任老师是启功在辅仁大学教过的学生，他的示范课选讲的课文是作家管桦的《小英雄雨来》。

文章说的是一个名叫雨来的小男孩被日军抓住后，被迫带路抓八路军，但是小雨来在半路上勇敢地跳进河里，于是岸上的日本鬼子向雨来跳河的河面上密集地开枪射击。文章至此戛然而止，没有交代雨来是否成功脱险，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

在这里，这位老师设计了一个问题：“小雨来究竟死没死？如果说他没死，为什么没死？”他希望有一部分学生说雨来被打死了，一部分说没被打死，然后各自陈述理由、进行辩论。但没有想到的是，从提问的第一个学生开始，所有学生的结论都惊人的一致：“雨来死没死？”“没死。”

“为什么没死？”“因为他的精神没有死。”这个答案和教学参考书上的答案完全一致。但按照规定的教学设计，这个由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和学生之间进行辩论几个部分构成的教学环节要占很长一段教学时间，如果按照学生的答案几分钟就处理完了，岂不违背了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

于是，这位老师只能硬着头皮一直问下去。提问了班里一大半的学生，回答仍然是：“没死”，“因为他的精神没有死”。这个统一的答案一直被重复了二三十遍。

课后，参加听课评议的老师照例说了一大堆“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师生交流充分”等空话套话。当这位主讲老师走到启功面前，向他昔日的老师征求意见时，启功带着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小雨来倒是没死，但是我快要死了。”“为什么？”“我快让你磨烦死了。”他用鲜明的态度表明了对教条主义教学方式的坚决反对。



艾青的常州岁月

周二中

1932年艾青因所谓“危害民国罪”入狱，著名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艾青在狱中所作。1935年冬，出狱后的他一时工作无着。1936年初春，经妹夫张恩介绍，艾青来到常州青果巷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师，教初中文三年级的国文，兼教毕业班的新文学。

当时艾青26岁，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他用一口金华方言，微笑着向同学们做自我介绍：姓蒋名海澄，浙江金华人。学生们都非常欣赏这位风度翩翩的老师。

艾青曾写，要求大家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讲自己的话，抒发生情实感，对社会、对人生、对理想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还曾接受校长的委托，主编校刊《洗心》，倡导学生写小说、诗歌、散文。在他的影响下，同学们纷纷订阅《作家》《译文》《中流》和邹韬奋主办的《生活》等进步

杂志和书报，一时间武进女师出现了新气象。

业余时间，艾青还带领学生到校外写生。一天，他看到一个学生画了一棵大树，大树荫下画了一棵小树，大树上题了蒋海澄的名，小树上写了学生自己的名字。他感到奇怪，问她何意，女生笑着说：“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是表达同学们共同的心声。因为你尽心尽力教导我们勤学苦练，追求真理；待人热情、真诚、谦逊。你留学法国，回国后宣传抗日日坐了三年牢，在狱中写出诗歌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你不事张扬，平易近人，大家都很敬佩。我想，只要努力，将来我也会成长大树，为国家作贡献。”

艾青对常州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还写过一首题名《常州》的诗，“一片低矮的住房/朝向天/晃着灰白的反光……”表达了对常州这一段特殊生活的思念。